

设立『国家情报局』，日本加速『再军事化』

本报记者 贾平凡

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并召开首次“国家情报会议”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，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。历史上，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、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，对亚洲邻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。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，慎重行事。

日本政府设立新的国家情报机构的节奏不断提速加码。今年3月3日，高市内阁向日本国会提交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》。5月，日本国会通过法案。7月24日，内阁会议决定由原和也出任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。7月31日，“国家情报会议”首次会议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，“国家情报局”同日挂牌。

依据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》，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包含两层架构：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在日本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，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，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、防卫大臣、外务大臣等11名核心阁僚，统筹整合外务省、防卫省、法务省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；“国家情报局”是“国家情报会议”的事务

二战后，美国占领日本，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把日本的情报体系拆分为内阁情报调查室、防卫省、外务省、公安调查厅、警察厅5部分。5个机构各自为战，壁垒森严、极少共享。这套“散装”设计的初衷，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机构一家独大。

过去七十多年里，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一直惦记着把这盘散沙捏成一个拳头。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执政后，先后出台《特定秘密保护法》、“共谋罪”法，试图建立中央情报机构，但由于舆论反对和政治敏感性，最终只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反恐情报收集单位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第四天，就责成内阁官房牵头研讨创设国家情报会议、国家情报局。

鼓吹所谓“周边安全风险”、利用日本右翼民粹高涨势头、抓

日本国家情报局重启了集权式情报体系，兼具对内管控的极权风险与对外扩张的安全威胁，双重风险引发广泛担忧。

连日来，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，对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表示抗议。英国国际新闻周刊《The Week》网站指出，日本社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情报机关是否会介入国内政治、是否会扩大国家监控范围，以及如何防止其沦为执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。

“对日本国内民众而言，最大担忧是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被侵蚀。”卢昊分析，统一集权的国家情报局缺乏独立第三方监督，权力高度集中且边界模糊。该机构可依托情报能力，监控民众网络言论、社会活动、私人信息，可能演变为管控舆论、打压反对声音、干预市民社会的工具，乃至重现军国主义时期特务

环球热点

从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，到发布新版《防卫白皮书》；从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战后新高，到推进二次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；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放开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限制，到把航空自卫队正式升格为航空宇宙自卫队……一段时间以来，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“外部威胁”为借口，加速“再军事化”进程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。

搭建起中央集权化、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

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“安全阀”，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，为其突破“专守防卫”约束、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

局，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，初期人员规模约730人，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。

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制定首份《国家情报战略》，并推进争议极大的《间谍防止法》立法。

“日本政府彻底扭转了战后情报力量分散、相互制衡的局面，搭建起中央集权化、垂直多层次的情报机构制度，掌握最高情报决策权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

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卢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相较于旧体制，国家情报局权限不再局限于辅助政府内阁调研，而是具备现实性乃至“实战化”的情报指挥与执行能力，可直接对接自卫队海外部署，指挥涉外谍报。这标志着日本彻底拆除战后情报监管“安全阀”，构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权式情报中枢，为其突破“专守防卫”约束、拓展对外战略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旨在服务日本战略转型与“再军事化”布局

在日本持续加速“再军事化”背景下，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，而是其突破战后体制、重塑军事权力、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

住国际安全形势动荡“窗口期”，日本政府为成立国家情报局煞费苦心。卢昊说，当前，日本右翼势力持续主导政坛，修宪扩军、摆脱“战后体制”束缚成为“政治共识”。同时，日本政府借全球安全局势动荡、地区冲突频发之际，大肆炒作“安全危机”，主张实力主义、自助安全理念，弱化国内和平力量反对声音。

“此举旨在服务日本战略转型与‘再军事化’布局。”卢昊分析，近年来，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及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推动国

家机器军事化，推进海外军事部署，构建主动威慑乃至实战准备态势。在日本看来，原有情报体系无法支撑远程军事打击、海外兵力投送、跨境安全干预等“新型作战方式”，统一的国家级情报中枢成为其军事化升级的必备配套，补齐军事行动的情报短板。

“在日本持续加速‘再军事化’背景下，国家情报局的成立，绝非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，而是其突破战后体制、重塑军事权力、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。”卢昊认为，一是彻底瓦解战后国

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

日本可能依托其情报体系常态化开展周边国家军事、民生、政务情报窃取，渗透区域事务，配合其扩军动作提升对外威慑能力，大幅增加区域摩擦与冲突风险

管控社会的阴影，导致日本国内民主空间收缩，公民隐私与言论自由面临威胁。

国际社会对此也保持高度警惕。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，日本集中情报权力的改革重新撕开尚未愈合的历史伤疤，在东南亚社会引发强烈不安。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弗朗斯·马查特提出，情报机构集权与日本扩军行为同步推进，这种动向不局限于东亚，会对全球安全秩序带来连锁影响。

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，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

“安全威胁”为借口，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、军事化转型，与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，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，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。

“对东亚周边国家民众而言，担忧源于区域安全秩序遭到破坏、战争风险上升。”卢昊说，东亚各国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，对日本情报集权、军事化扩张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。迄今为止，日本不仅从未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清算，国内右翼民粹、历史修正主义逆流更趋

观象台

国际人士谈“十五五”关键词⑮



非盟与中国的深度对接，代表全球南方探索科技自立自强与共同繁荣的共同心声

2026年是中国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。中国在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并强调“推动建立各国广泛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，共同构建平权、互信、多元、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，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”。这对非洲国家等全球南方经济体意义非凡。

长期以来，西方主流科技巨头主导的开源高价路线，对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非洲大陆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，这种技术高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“数智鸿沟”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在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中强调要“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”，并明确提出“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”。

这一普惠理念正在非洲快速落地：中国顶尖开源模型通过深耕非洲市场的中国智能终端出厂预装，直接走进数亿非洲用户的日常生活；华为云等基础设施服务商持续加强在非洲的投入，打造非洲智能化的数字枢纽，降低了本地部署成本。结合非盟《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》等战略的推进，中国的开源技术正在转化为非洲本土的社会生产力。

技术落地的实效，关键取决于其能否契合合作双方的发展诉求。非盟在《非盟大陆人工智能战略》中强调在农业、医疗、教育及本土语言保护等优先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应用。这些方向与中国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中的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方案高度契合。近年来，非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亮点纷呈。比如，面对非洲50多种主要本土语言在西方模型中的缺失，中国开源生态为非洲开发者提供了微调的机会；针对吸纳非洲近半数就业人口的农业领域，中国的AI技术正助力精准病虫害预警与产量预测。

不久前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，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领域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(WAICO)正式成立。这彰显了中国落实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的决心与行动力。

长期以来，在国际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治理中，发展中国家缺乏制度性话语权。WAICO的29个创始成员国中，包括阿尔及利亚、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、南非等10个非洲国家，中国还承诺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、面向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。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。非盟与中国的深度对接，代表全球南方探索科技自立自强与共同繁荣的共同心声。

中国“十五五”蓝图已然展开，中国先进的技术积累、开放的生态理念，与非洲蓬勃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正产生强烈的共振。期待非中携手以开放、普惠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，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全球南方力量。

（作者为布隆迪汉学家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，本报记者王慧琼采访整理）

非中携手助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

班超

中企在吉实施灌溉工程、光伏发电项目助力民生改善——

“希望引进更多中国经验和技术”

本报记者 张志文 白阳

日前，中国—吉尔吉斯斯坦媒体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联合采访团队走进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和楚河州，采访中国援吉灌溉系统改造工程和中企投资建设的楚河州100兆瓦光伏项目，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利用当地优势自然资源——水能和太阳能，持续助力当地民生改善。

位于伊塞克湖附近的阿克奥隆村，汨汨清水顺渠流淌，滋润沿途千顷农田，杏树林里挂着成熟的果实。这里属于中国援吉灌溉系统改造工程灌区，由中国中铁五局承建。项目新建、改建渠系总长87公里，配套完善闸阀、桥梁、倒虹吸等全套水利设施。该工程让当地新增2310公顷耕地，原有1.11万公顷农田灌溉也得到保障，惠及2万多村民。

“水渠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。”阿克奥隆村前村长梅拉姆·科德拉里耶娃说，中国援建的灌溉渠道修成后，曾因缺水而撂荒的土地焕发了生机。如今，村民们可以种植果树、加工饲料，获得稳定收入。灌区水渠旁也成为村民们夏季休闲纳凉的好场所。

吉尔吉斯斯坦《旗帜报》记者阿克坦·萨里耶夫表示，中国援吉灌溉系统改造工程等一系列“小而美”的民生项目，实实在在地帮助当地农民改善生产

生活条件，实现增产增收。“在采访中，我们真切感受到，当地民众非常感谢中国朋友的支持与帮助。”

群山环绕，阳光灿烂，一排排蓝色光伏电板整齐排列。楚河州100兆瓦光伏电站所在位置，年均有效利用光能时长达1580小时，是理想的光照资源采集地。

楚河州100兆瓦光伏电站是吉尔吉斯斯坦首个建成投运的大型光伏电站。中国延安久久光电公司是投资建设方之一，其子公司永生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俊刚介绍，项目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，2025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，目前已累计发电1.28亿千瓦时，满足近3万户家庭用电需求。全年预计发电约2.1亿千瓦时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逾15万吨。

“看到这里持续输出清洁能源，我很激动，也很震撼。”《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》记者安德烈·托科姆巴耶夫说，以前夏季高温天气，吉尔吉斯斯坦电力系统常因不堪重负而限电。中企帮助建设光伏电站，有助于推动吉能源结构多元化，减少电力进口依赖。他表示：“中国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，希望引进更多中国经验和技术。”

（本报吉尔吉斯斯坦巴雷克奇电）



中交一公局集团承建的喀麦隆尼永河大桥竣工通车仪式8月5日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—凯莱举行。
▲人们从尼永河大桥上走过。
►喀公共工程部长埃马纽埃尔·恩加努·朱梅西（前三）等嘉宾为大桥通车剪彩。
科普索摄（新华社发）

喀麦隆尼永河大桥竣工通车

环球掠影